



春秋辞令文体研究

Research on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Styl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董芬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春秋辞令文体研究

Research on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Styl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董芬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辞令文体研究/董芬芬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325 - 5708 - 0

I. ①春… II. ①董…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春秋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390 号

责任编辑:马 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春秋辞令文体研究

董芬芬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5 - 5708 - 0

I · 2246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赵逵夫

一部中国文学史,秦汉以后二千二百多年中作家的情况、作品的时代及整体的发展状况,都比较清楚,而先秦一段,大部分的文学史著作不以时代先后为序来叙述,而是以“历史散文”、《诗经》、诸子散文、《楚辞》为单位来叙述,有的在前面加上“神话与原始歌谣”。学者们的研究一般也是按以上四个方面,少有划成若干时间单元而论述者。所以,可以说先秦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用了一种“囫圇研究法”,文学史的论述也大体处于一种混沌状况。而战国以前的先秦文学即使只算到夏代,也有1800多年,现在很多文学史的描述,未能较清晰地反映出先秦文学在这1800多年中的发展进程。

不仅如此,因为对先秦文学的发展不清楚,故对一些文体形成时代的认识,也便模糊不清。我国古代各种文体中产生最早的是诗歌^①,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散文各种文体的形成,看法就有较大分歧。如谈到论辩之文,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昭后世。”后代学者多从之。但诸子之书,最早为春秋末年的《老子》和《孙子》。至于《论语》一书,虽为孔子的言论,但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为弟子、门人所记述,还不能说形成于春秋时期。就《老子》一书来说,前人以为老子所亲著^②,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郭店楚简《老子》先后证明《老子》一书在流传中曾经战国时人的修改,因之,一些学者主张将《老子》也置于战国时代。《左传》、《国语》二书学者们是看做“历史散文”的,归于叙事一类。因此,把古代散文中的议论文的形成同先秦诸子捆绑在一起,其上限便只能到战国初年。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应该弄清。第一个问题,包括儒、墨、道、法、兵、名、

① 诗歌之中产生最早的音乐歌词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如《葛天氏之歌》,稍后有祠神仪式中用的诵词,如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神北行!先除水道,后决沟渎”。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老子至关(散关),“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农、杂、阴阳、纵横等在内的先秦诸子是怎么产生的？是在春秋末年凭空产生出来的，还是在此前有各种思想倾向的思想家，留下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言论，老聃、孔丘、墨翟、孙武等在继承了他们学说的基础上，当春秋战国之际王室衰微，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之际，提出了自己治理天下的理论？关于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各有所出。班固之说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并不准确，如他以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便有问题。自然，从儒者最早的职业来说，近于掌礼之官，但其发展为一个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思想学派，显然是继承了周公旦以来主张以礼乐治天下的各种学说而形成的。就周公来说，留下的论著有的传至今日（《尚书》中的《无逸》等可以证明）。道家出于守藏之史，因为老子本为守藏史，所以班固之说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文献中记载老子学于容成，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看法，马王堆出土汉墓帛书《十问》有黄帝问于容成，可能即《容成子》中的一章^①，《庄子·则阳》中也有《容成子》遗文。恩格斯曾科学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而并未说只是出于某一家，因为任何的思想创新总是在对前代留下的思想资源做新的综合、归纳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创必有因。正如王国维论古代文学所说：“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②那么，我们要论清先秦诸子发展的过程，也就必须要考察它以前有关思想家的论述；要论清先秦议论文的形成、发展的状况，也就不必以先秦诸子为限。

第二个问题，学者们认为《左传》、《国语》都成书于战国时代。但其所记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大段论述究竟是《左传》、《国语》编者根据自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认识悬想而写成，还是属于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述？也就是说它们是编者的创作，还是史官依据有关文献，根据需要剪裁而编入？历代评点《左传》、《国语》者，多为文章家，好用起承转合等评时文的一套去评点其中的一些段落，或概括论述全书，因之，无形中将它们看做两书编者的手笔（后人多将编者与作者混为一谈）。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左传》一书乃是鲁国瞽史左丘明根据鲁史所编述的春秋时历史故事，通过讲述历代成败兴亡反映了他的崇礼尚德和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思想，作为国君治国的借鉴。司马光纂《资治通鉴》而上继《左氏春秋》，乃是其卓识：二书体例上稍有区别，而编纂目的和历史作用完全一样。其不同处，是因为《左氏春秋》脱胎于鲁史《春秋》，故于春秋时诸侯间聘问、赴告、结盟等记载较多，

① 饶宗颐《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页。

② 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00页。

显示着时间的框架,再者在当时书写工具不太方便的情况下,它主要由瞽史向君主、卿大夫讲述,故对某些情节的描述十分细致生动;《资治通鉴》一书则因为产生于纸张和印刷术产生之后,又是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而成,故历史概括性强,对于事件的叙述在于充分体现编者的学术主张,故显得较为均衡。二者的差异主要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所以说,《左氏春秋》是以历史记载为框架,而用文学的手法丰富了一些细节,它所反映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和所引述的一些历史文献及重要论述是有历史依据的。以往的一些历史学家将《左传》中所写细节也作为论史的依据,是错误的;现在一些文学史家以为其中所写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及各种辞令全是虚构,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在作历史研究与作文学研究时拿不同的两条标准来对待《左传》这一部书。

《国语》一书情形与《左氏春秋》相近,而其中的《周语》、《鲁语》、《楚语》皆为记言的文字,所录存往哲前贤之“语”。“语”是当时一种特殊的文体。《说文》:“语,论也。”正说明了这种文体的性质。《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论王太子教育中的九种教材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春秋事语》和《国语》中记言的部分皆属此类。《国语》之名为“语”正是就这一部分而言的。这些议论文字一部分是谏说人主或大臣的,一部分是外交辞令,还有一部分是借生活中某些事阐发自己做人、持事、行事,处理个人同国家、他人的关系,以至天人关系的态度及理论依据,或者正面讲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的观点。西周自周公开始将天命与个人修养、德行联系起来,又重礼,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引夏商事例以阐发,形成联系古代引经据典以论事的文风,贵族总讲究在个人行事中不断维护和完善这种社会伦理与思想体系,此即所谓“立言”。而《国语》中的《齐语》、《晋语》、《郑语》、《吴语》、《越语》则是瞽史讲述历史事件的记录稿,其形式与《左氏春秋》一样,而其中的一些辞令也同样是流传有自,非编者凭空想象写成。就与《左传》中共同记载的辞令而言,有的某一方面为摘录,或两书所载都是摘录,各有删节,但都应是来自原文,应反映着原文的思想和语言的基本风格,其完整者,也反映着原文的结构。

自然,《左传》和《国语》的《齐语》、《晋语》、《郑语》、《吴语》、《越语》中,有瞽史根据事件的梗概与人物的思想虚构的对话,但这些就每个人的发言说,都比较短,少有长篇大论。而本来为独立的辞令应用文被录入书中者,一般有几个特征:(一)篇幅较长;(二)结构较完整;(三)书面语言的特征突出,多引经据典的情况。

这些论谏文字本为独立篇章,从《左传》、《国语》叙述文字中也可以看

出一些迹象。如《国语·楚语上》载,楚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晰问于范无宇”,下面接“对曰……”云云,以下有三百余字的议论,然后说“子晰复命,王曰”云云。则范无宇戍于申,不在都城,因而王命仆大夫子晰专程去征询意见,范无宇以书面呈辞上告于君,绝不敢随便以口信的方式复命。

《周礼·天官》云:

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

郑玄注:“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

从书中与上下文的关系上来说,有两类情况:

一类是独立录入书中,与上下文没有关系。这一类有的还比较短,也不一定有上面所说的三个特征。这当中又有两种:一种《左传》中的“君子曰”,全是摘录有关文献中的文字。第二种,引录其他嘉言善语,如《左传·闵公元年》录士蒯的话,以“士蒯曰”引卜偃的话,以“卜偃曰”引起,上下无所承。瞽史或编者为了情节连贯,往往将这些本来是独立成篇的文章,也处理得同于当面的对话。这样一来,故事情节更为紧凑,也增加了矛盾冲突性与戏剧性。比如《国语·周语上》载《邵穆公谏弭谤》开头说: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然后是:“邵公曰:‘是障之也。’”这“是障之也”四字,今天都是作为正文的组成部分标点,与下文连在一起的,当然,事实上也只能这样标点。但细心研究全文,这四字乃是瞽史或编者概括讲述者原文之意,以领起所引述原文。如果剥离了瞽史或编者所加概括其大意的“是障之也”四字,则所引述乃是一篇完整的上书。厉王无道,国人侧目,应非一日之事,突然发生。邵穆公欲谏,也非突然想起,无所准备。邵公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在谏说方式以至语言方面都有所斟酌,他不会不写成书面东西,而去临时措辞;他是要考虑后果的。所以,这是一篇上书应毫无问题。这种情况在《左传》、《国语》中不少。这一类所引录文字在开头都有类似于“是障之也”之类概括辞令大意或作者基本态度之语以衔接上文的简短文字,其特征是

只表明要论说事情的基本态度,语言极简短。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即如上文所举邵公谏弭谤前面的“是障之也”,根据下面引录的辞令的内容概括其基本内容或基本态度,既考虑到叙事中的衔接,也考虑到辞令的内容。一类是只根据辞令中表现的态度用“可矣”、“是也”、“唯唯”之类,或“不可”,来承接上文,以下便是所引录的辞令。因为所录以谏阻文字较多,故最常见的衔接词语为“不可”。

《周礼·夏官》中又言“太仆掌诸侯之复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与其吊劳”。看来周代有专门负责掌管三公以下卿大夫上书的人,周代史官制度又健全,其中那些影响及朝政和对以后有主要借鉴意义的文献,也不会不予记载,不会不予保存。

为了叙述的方便,史官们将一些书面讨论的意见以对话的形式写出的情形,不仅先秦时在瞽史讲述记录稿基础上形成的《国语》、《左氏春秋》如此,后世史官也往往用此办法。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要对前代史书中所载一些人物和议论文字有所判别,不能不进行细致的研究,因而,于此深有体会。该书《凡例》第七条中说:

史家语例,颇未划一。如《魏志》张既、王基千里陈事,不云书启。

这就说得十分清楚。只是先秦时代瞽史讲述历史事件其目的主要在于供君主借鉴,在有益于世,重在明道崇德,辨别是非,对保留文献的完整性及独立著作的地位没有考虑,所以,以上情况会更多、更普遍一些。刘知几《史通·申左》中说: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谏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哉?

真不愧为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可谓一语破的,其价值超过很多陈陈相因的皇皇巨著。应该说,《左传》、《国语》、《春秋事语》中所录一些文字,也有史官所记或论者事后追记的情况。古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仅记国君之言、国君之事,卿大夫之言关乎国事、朝政者,虽简短言语,系主张所在,亦当书之。估计史官所书者文不会过长。而其事后补记者则同事先形诸简牍者

情形差别不大。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先秦文献,尤其文学文献形成与流传中的一些问题。固然,旧的史学家以传说为信史,对传世文献缺乏科学分析,以后世文献的形成方式来理解上古文献,造成很多虚而不实、完全谬误的结论,问题很大。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用实验主义的一套来研究人文科学,也是有问题的。这有点像“文革”当中打“反党”、“反革命分子”的,一是只作有罪推论,二是株连。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在疑古风弥漫情况下学术界的状况,也是:(一)只作“有罪推论”,不作“无罪推论”。只找疑点,忽略可以证明为先秦时文献的理由与证据。(二)株连。一篇中之一句、一段有问题,则全篇有问题;一部书中一篇有问题,则全书伪。因为用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判定了不少伪书,也使很多论著的时间被大大移后,甚至排除在先秦文献之外,不考虑先秦文献流传的具体情况,只从语言风格、词汇等判定时代,不可能不出现错误。

所以,对先秦时代一些篇章形成一些著作成书情况的具体分析,还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十分必要。我感到,这方面一些问题的解决对先秦文学、历史、哲学等的研究,都具有很大意义。只从文体学的方面来说,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有一个大的转变。

董芬芬同志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后来又在本校攻读硕士学位,在我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以后有一段时间赴埃及开罗大学访学,回来后又考为我的博士生。她到埃及一趟,思想上很受启发,看问题思路更为开阔。在中埃文化的比较中,她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她对中国古代神话也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讲课中也提到一些先秦散文产生与文体形成方面的问题,她也感到很值得探索,她的学位论文选题便为《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本书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以为人类在步入文明之前便产生了文体,它的形成同所讲说的内容、对象有关,也同作者(讲话者)的身份有关。自人类社会形成,语言的交际逐渐趋于复杂化,便开始了文体的孕育。在氏族社会中,部落首领、部落联盟首领向部落成员讲话,便是谕告的滥觞,因为面对很多人,讲的又是对整个部落、部族有关的大事,而语气上或动员,或晓谕,或命令,同一般交际中的言语的表述无论在开头、结尾、层次还是语言风格上,都会有所不同。而氏族成员或氏族首领向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报告,总是关于局部的事情,或出于个人自身角度的观察,是否合于大局,不敢自信,只是以建议或提请考虑的语气提出,或者只是某种要求,因而其导入的话语,结尾的总括性及语气,也就有较大的差别。甚至于,在篇幅上,也会因表述者与接受者身

份的不同和所表述内容的不同,有所差别。这样,事实上文体的区别已经形成,同我们今日之所谓文体的区别,只在于一为口头表达,一为书面语言而已。那么,可以肯定,在文字产生之后,我们今日所谓之文体便开始形成。在殷墟发现甲骨文,已经是比较复杂的文字。台湾学者李孝定和大陆学者郭沫若、于省吾等先后提出,中国在6 000年前已产生了文字。我们即使以较成熟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世纪,则同今日文体相近的一些文体在尧舜时代即已产生。今日我们只看到刻在甲骨上的很简短的文字,但当时未必没有其他的书写工具,只是这些易朽坏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而已。甲骨上只刻有占卜文字,而《尚书》中却存有《盘庚》(上、中、下)那样长篇大论的东西。

当然,文体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同社会礼仪、风俗和语言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文体会消失、转变或合并,而有的则随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活动的产生分化,同时也会有新的文体。我国成熟的戏剧创作至南宋以后才出现,较诗歌的产生迟3 000多年,说明各个民族中不同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不一样的,并非平衡发展。我们也不能以各种重要文体是否都已产生为文体形成或成熟的起点。

但以上这些问题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来作说明,而其中比较关键的是对春秋时代各种散文文体的状况的认识。因为西周以前所留文献不多。《尚书》中的一些篇章,前代学者已有论述,《逸周书》中西周时代文献也可以例之以《尚书》加以确定,而春秋时代的散文作品,按传统说法见于《国语》、《左传》,而按今人的普遍看法,认为是战国时代产物,同时皆属“历史散文”,不可能再作分析。董芬芬同志的学位论文选取了春秋时代各种辞令来研究,原因即在此。其着眼点在“辞令”,而不是什么“历史散文”。那就是说,《国语》、《左传》中包含一些本是独立成篇的议论文、应用文等文体,论文就是要从这些具有文体意义的独立的篇章中,来考察当时文体的状况。关于当时的叙事作品,论文有涉及,因为就《左传》和《国语》中《晋语》、《吴语》、《越语》等来说本是叙事的,是讲史类作品甚明,不必多言。

董芬芬同志用两年多的时间,于2006年初完成了论文。我觉得这部书无论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不少创获。

第一,将春秋辞令分为盟、誓、谏、祝、国书、书牋、命令、谏诤、议论、外交辞令十几种文体,可以说是对散文文体中叙事文体之外主要文体的一个全面的分类。这自然主要是考虑到汉时散文文体存在的实际,但同时也上窥其源而下探其流。书中有几种文体联系到《尚书》甚至甲骨文、金文中的篇章,向下联系及战国甚至汉代的作品。作者以春秋时代辞令的几种文体作

为古代文体发现的一环,而不是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考察。兼顾及先秦时代文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对全面了解春秋时代文体的状况是有意义的。

第二,全面清理、钩稽春秋时代有关散文文体的材料,包括严可均以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并吸收学者们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排比分析,既澄清了在春秋时代文体认识上模模糊糊、甚至似是而非的观念,也开拓了先秦散文,尤其是春秋时代辞令研究的范围,加深了对春秋时代各种应用文体和议论文体的认识。比如过去人们读《左传》、《国语》等,关于其中的盟辞,因为原文中往往随文叙出,多误为只是当时口头说说。本书引了侯马盟书、温县载书,说明了当时的盟书、誓词也是书之简册的。又引孙诒让《周礼正义》中所说:“盖凡盟书,皆为数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归,而盟官复书其书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别授之官,以防遗失,备检勘,慎重之至也。”按说《周礼正义》并非罕见之书,但近代以来以为经学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可靠,不予相信,而研究文学史者只看原文在人名后以“曰”字领起,以为只是口说而已。今将前人之说与考古材料相联系便一目了然。

第三,先从盟书、誓辞、谏文、祝祷辞、国书、书牋、命令这些特征明显,文献记载得较清楚及地下出土材料有所印证的文体入手论述,证明了春秋之时具有文体意义的独立篇章存在于“历史散文”中的事实,并广泛联系论证了它们的文体特征,为进一步论证《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中存在一些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议论文字铺平了道路。

第四,由《文心雕龙》及其前、其后的古代文论著作和有关论述中钩稽有关先秦时代文体的论述,以与有关文本相对照,按古人的意识来认识、考察、清理这些文体,然后以今日之眼光加以阐释,做到既不强加于古人,也具有科学性。

我以为论文的意义不仅在文学史的方面,也关系到对春秋时代礼仪、制度、教育及各类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对春秋时代一些历史事件政治活动的理解。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后两千多年为实,前两千多年为虚。近几十年的大量的考古为我们认识从我们的祖先敲开文明社会的大门到建立国家,提供了依据。根据李学勤等先生的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 农耕聚落期(前 7100—前 5000 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等文化所反映,和前 5000—前 4000 年的半坡、姜寨文化所反映)。

(二) 中心聚落期(前 3500 年—前 3000 年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早期文化所反映)。

(三) 早期国家文明和确立时期(前 3000—前 2000 年夏王朝之前的方

国崛起时期,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和古史传说中的颛顼、尧、舜、禹时期)。这个阶段,即都邑国家时期^①。

从2004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交陵县杨官寨的一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聚落遗址,最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聚落环壕,其作用与后代的城壕(古曰“池”,故通称城为“城池”)一样,为了防御敌人之入侵,便于防守。这环壕的周长约1945米,近四华里。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孟子·公孙丑下》)则杨官寨城壕已与战国城邑的规模相仿。此环壕宽6到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3米。环壕西部发现一处门址,宽约2.7米^②。就此形制而言,除没有城墙之外,其他同后代城池没有多大区别,即壕之深、宽而言,至明清时代一些县城的城壕也大体如此。专家们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骨、石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聚落延续时间很久,可以说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聚落。另外,我想到:挖这么深、这么宽、这么长的壕,挖出的土到哪去了?会不会堆在壕内形成了一道墙?因为壕内的圆比壕要小,如照原来土的密度堆,则其高度、宽度应大于壕的深度、宽度,而如通过夯筑,密度加大,则大体相等。而如减少了宽度而增加了高度,那么,这已同后代城墙相近了。而这个聚落的时间属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000年,属于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中心聚落期。根据中国传说古史,应相当于炎黄时期。

我说这一些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认识,要有一个转变,应更清晰地去认识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与之相应,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形成、发展,也应作些细致深入、全面的研究,而不能用“囫圇叙述法”,使它永远处于混沌状态。因此,我认为董芬芳同志此书,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我更希望学者们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即使是提出否定性意见,也有益于我们在认识上的推进。学术只有在讨论中才可以发展。是为序。

己丑年正月初一于珠海暨南花园

①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15页。

② 杨永林《杨官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节点》,《光明日报》2009年1月12日。

前言

一

辞令,亦称“辞”、“命”,或“辞命”。提到辞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行人精彩的应对之辞。《说苑·臣术》晏子论社稷之臣说:“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①人们一般把这种“分布于四方”的行人应对之辞称为“辞令”。本书所讨论的“春秋辞令文体”含义更为宽泛,既包括行人应对之辞,也包括春秋时代人对神的告语、上对下的各种文告命令、列国卿大夫对其君主的上书谏诤以及当时人们的各类议论之辞。古人把这样的应用之文也称作“辞令”,《周礼·春官·大祝》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谏。

郑玄注引郑众:“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②祠、命、诰、会、祷、谏等都被称作“辞令”。刘熙载说:“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③所以,古人所说的“辞”、“辞令”,包含先秦不同场合饰礼致情所使用的各种应用之文。本书沿用古人的这一概念,用“春秋辞令文体”来指称包括太祝“六辞”在内的春秋时代常用的几种文体。它们多保存在《左传》、《国语》、《礼记》、《史记》等典籍中,除少数篇目以外,大多以对话的方式载录,让后

①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页。

②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809页。

③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人误以为它们多是临场应对、矢口陈辞,忽略了它们作为文体的本来面目,“辞令”一词,也从某一角度揭示了这些文体在史籍中的存录状态。

太祝“六辞”中涉及的各类文体,在《左传》、《国语》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和篇目。

“祠”,郑玄引郑众:“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又说:“祠者,交接之辞。《春秋传》曰‘古者诸侯相见,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辞’之辞也。”^①也就是外交辞令。《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论语·宪问》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刘宝楠注把其中“为命”的“命”分为“主国之命”和大夫备用之辞令^②,认为“主国之命”“其语皆有一定”,楚庄王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左传·宣公十二年》)、卫杀孔达告诸侯(《左传·宣公十四年》)、吕相绝秦(《左传·成公十三年》)等国家之间对话相告之辞,属于“主国之命”类的国书。而大夫之辞“辞无常”,楚屈完对齐侯(《左传·僖公四年》)、烛之武说秦伯(《左传·僖公三十年》)等行人的应对辞令属于“祠”中的大夫外交辞令。

“命”,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谓:“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明人吴讷说:“考之于《书》,‘命’者,以之命官,若《毕命》、《冏命》是也。”^③周惠王赐楚成王胙(《史记·楚世家》)、周襄王策命晋文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平公赐公孙段策(《左传·昭公三年》)等皆属“命”类。

“诰”,徐师曾说:“按字书云:‘诰者,告也。告上曰告,发下曰诰。’古者上下有诰。”^④所以“六辞”之“诰”,包括命令之类的下行文和论谏之类的上行文。鲁宣公以书告季文子(《国语·鲁语上》)、越王勾践号令三军(《国语·越语上》)等为上告下之辞。臧僖伯谏观鱼(《左传·隐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左传·僖公五年》)等诸如此类皆为下告上之辞。

“会”,郑玄注:“会,谓会同盟誓之辞。”^⑤“六辞”之“会”,包含盟、誓两种文体。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于宋西门之盟(《左传·成公十二年》)等都是盟辞。晋士弱戏之诅辞、郑公子骅戏之誓辞(《左传·襄公九年》)等,都是会同场合的约信之辞。

①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年版,第 809 页。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367 页。

③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6 页。

④ 同上,第 115 页。

⑤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年版,第 809 页。

“祷”，郑玄引郑众：“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①郑玄又补充：“祷，贺庆言福祚之辞。”先秦的祝祷辞不仅包括祭祀时的祈祷、嘏辞，而且也指人们之间的庆贺之辞。晋荀偃祷河（《左传·襄公十八年》）、卫太子蒯聩战祷（《左传·哀公二年》）等即为祷辞。

“谏”，郑玄引郑众：“谏，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②是丧葬时的应用文。春秋辞令中楚共王谏（《左传·襄公十三年》）、孔子谏（《左传·哀公十六年》）等皆属谏辞。

太祝“六辞”之祠、命、诰、会、祷、谏等，都是春秋礼仪文体的重要内容。其实，《左传》、《国语》等典籍所载辞令，其中包含的文体比太祝“六辞”还要宽泛，比如春秋的书牋和议论文辞，太祝“六辞”并未涉及。《诗·邶风·定之方中》毛传云：

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谏，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③

其中提及的九种文体，皆是春秋各种礼仪场合的常用文体。刘师培《论文杂记》注云：“此乃后世文章之祖也。建邦能命龟，所以作卜筮之繇辞也。田能施命，所以为国家作命令也。若夫作器能铭，为后世铭词之祖。使能造命，为后世国书之祖。升高能赋，为后世诗赋之祖。师旅能誓，为后世军檄之祖。山川能说，为后世地志图说之祖。丧纪能谏，祭祀能语，为后世哀谏祭文之祖。”^④南宋陈騏《文则》从《左传》中条述出春秋时代的八种文体：

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恇；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辨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⑤

《文则》所说的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八种文体，同太祝“六辞”、大夫

①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年版，第 809 页。

② 同上。

③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年版，第 316 页。

④ 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19 页。

⑤ 陈騏著、刘彦成注译《文则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5 页。

“九能”交相辉映、互相补充。不仅如此,陈骙还在《左传》中给这八体分别找出了例子:“命”以周襄王命重耳(僖二十八年)、周灵王命齐侯环(襄十四年)为例,“誓”以晋赵简子誓伐郑(哀二年)为例,“盟”为亳城北之盟(襄十一年),“祷”为晋荀偃祷河(襄十八年)、卫蒯聩战祷于铁(哀二年),“谏”为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郈鼎(桓二年),“让”为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潁(昭九年),“书”为子产与范宣子书(襄二十四年)、晋叔向诒子产书(昭六年),“对”为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二十五年),顺着这些思路,在《左传》、《国语》中还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本书就是在太祝“六辞”、大夫“九能”及《文则》“八体”的基础上,分为盟书、起誓辞、诂辞、祝嘏辞、谏文、誓师辞、策命、书牒、国书、外交辞令、谏诤文辞、议论文辞等十几类进行探讨,力图展现春秋时代辞令文体的类别和特点,从而认识春秋时代文章的时代风貌和存在状态。

二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左传》记言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①钱钟书先生道出了大多数人对春秋辞令的看法。的确,《左传》有史家为追求生动而运用想象的因素,《左传》、《国语》都存在拟言、代言的情况,但这仅限于一些细枝末节的情节叙述,重要场合的重要言论不会是左氏的构撰。刘知几《史通·申左》谓《左传》中的辞令:

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②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对史传记言的看法值得重视。《左传》、《国语》中相当一部分辞令可以看做独立的文章,它们结构完整,主题明确,绝非简单的代言、拟言所能概括。

①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5、166页。

②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